



论考古学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曾 丽 赵丛苍

摘 要:“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人类学中用于解释社会与文化现象的重要理论,可为考古物质遗存中存在的层级分化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在考古学研究中,大传统通常指由上层统治阶级创造的文化,具有先进性、权威性、传播性以及象征意义;小传统代表下层民众的文化,呈现出稳定性、自足性、生活化的特点。大传统与小传统虽各居格局层次,但相互关联。进入文明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大传统往往呈现出一致性,而区域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既趋同又分化。两者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将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引入考古学研究,对认识古代文化结构、区域考古学文化内涵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大传统;小传统;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层次

中图分类号:K854;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4-0076-07

考古学以古代人类活动形成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涵盖统治阶层与平民阶层留存的遗迹和遗物。与文献记载往往聚焦于统治阶级的历史不同,考古资料是对不同阶层历史的客观再现。然而,考古遗存具有一定复杂性,有些现象难以解释,尤其是在一个遗址或一种考古学文化中,不同等级的器物在文化内涵与面貌上表现出不一致时,就会使研究陷入困境。而大传统和小传统理论能为我们开辟一条走出困境的通道。

一、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的考古学解读

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人类学中用于解释社会与文化现象的重要理论,考古学在研究古代人类社会时,同样可以借鉴并运用这一理论。

(一)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

“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956年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1]

两个传统相互依赖,且相互影响。大传统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会影响社区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社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又会影响大传统的意识形态。但也存在大传统和小传统分道扬镳

收稿日期:2025-10-02

作者简介:曾丽,女,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陕西西安 710127),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赵丛苍,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127),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科技考古、军事考古学和医学考古学等研究。

的现象,会出现全社会积累下的知识一分为二的现象^①。

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影响广泛,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后,推动了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以及士绅阶层等核心问题的思考,对专业问题作出新的解释,有效拓宽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分析维度与研究思路。

(二)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在考古学中的含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低级与高级层级之分,就考古学所观察到的古代复杂社会来看,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即大传统和小传统。考古学大传统是指由上层统治阶级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高等级居址、墓葬及器物(铜礼器、玉器、陶器)等遗存中。考古学小传统代表下层民众的文化,它是村落中自发形成的的大众文化,附着于小型居址、墓葬及普通民众使用的器物(陶器)等遗存中。需要强调的是,陶器是一种具有普遍使用性的器物,既可为上层统治阶级所用,也可为下层民众使用。

就考古出土的物质遗存而言,其作为古代人类生产、生活、思想、信仰的载体,涵盖多个方面,层级区分体现得尤为直观。在考古学领域,徐良高先生率先将该理论运用于三代考古的研究中,他认为:“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并扮演着独特政治工具角色的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礼乐文化、文字等大约可以代表文化大传统,而基本担负日用功能的陶器、民间信仰遗存等大致代表了文化小传统……即以青铜质和玉质礼器为表征的礼乐文化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反映了当时已经形成具有广泛认同的文化大传统;而以陶器为表征的不同区域日常生活方面的物质文化面貌则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即各区域有自己的文化小传统。”^[2]

尽管考古学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二者并非完全割裂、互不相关。相反,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大传统会主动吸收小传统中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文化价值的元素,以此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增强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小传统也会积极借鉴大传统中

先进、适宜的文化成果,以提升自身的文化品质和内涵。这种双向的吸收与借鉴,使得大传统与小传统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又共同推动着整个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文化生态系统。

二、考古学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特点

以上层阶级的制造与使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大传统,和以下层平民的制造与使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小传统,各具典型特点。

(一)考古学大传统的特点

作为上层阶级文化表征的大传统,其相关的遗迹遗物主要包括高等级建筑、大型墓葬、国家祭祀遗存、规模化的手工业作坊,以及铜礼器、玉器、陶器等。

1. 先进性

考古学大传统反映的是统治阶层奉行的文化体系。他们凭借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能够有效地聚集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创造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物质文化。这些先进的物质文化不仅体现在珍贵的原材料、前沿的工艺技术以及精美的造型设计上,更重要的是,统治阶层常常会赋予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巩固统治和引领时代发展的物化载体。它们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文化传播和价值观推广的重要工具。这种文化与物质载体的深度交融,使得大传统在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

以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为例,其制作权由王室或贵族掌握,铸铜手工业作坊通常位于都邑内,致使青铜器的生产成为一种高度垄断的行为,属于考古学的大传统范畴。青铜器的使用逐渐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统治者据此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即通过对青铜器使用场景、种类和数量的规范,来明确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从而有效地维护统治秩序。这些物质载体,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精美程度,还是赋予其中的文化内涵,都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先进性。

2. 权威性与传播性

在古代社会,文化大传统的主要创造者是

社会上层群体,他们往往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掌握着统治区域的治理权,其推行的文化在政权的支持下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周代的礼仪文化、秦国的军功法制以及汉初的黄老之术等,都是由上层统治集团主导并推行的文化体系。这些文化不仅反映了统治阶层的意志和价值观,更成为他们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

为了构建统一的社会认同,上层文化需要广泛传播。凭借政权的力量,上层文化往往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例如,商代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礼制文化不仅在都城地区中有大量发现,在作为地方方国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樟树吴城、四川广汉三星堆、陕西清涧寨沟等遗址中,也都发现有与中原地区文化面貌一致的青铜礼器。又如,汉初推行的黄老之术,其在考古学上的体现是卷云纹瓦当在全国各地的使用。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上层文化的标识性器物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也占据主导地位。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分别作为夏时期中原与西北地区文化的代表,它们之间的交流主要集中在铸铜技术,以及绿松石铜牌饰、陶盃、玉器等高等级器物上,很少涉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用器。上层文化的强大传播力,不仅推动了其统治地位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3. 象征意义

代表考古学大传统的物质遗存,往往凝聚着当时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经由人们反复的提炼与升华,达到了当时社会认知的顶尖水平。上层阶级所创造的物质,往往体现了统治者的核心政治思想与信仰体系。一旦这些物质被制作完成,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有了具象化呈现,通过对其持续的传播与推广,会逐渐塑造并主导社会主流意识。相比之下,下层民众日常使用的器物,更多地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生产紧密相关,其功能性和实用性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所蕴含的思想与信仰内涵相对较少。

中国古代都城中的宫城,其建筑规模、布局 and 位置都充分彰显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宫城通常位于都城的中轴线上,承载着“居中为尊”的理念,彰显出王在国家中的核心地位。玉器在

中国有着近万年不间断的历史,属于上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前时期,玉器成为神权、王权、军权的象征;进入夏商西周时期,出现了大量礼仪用玉,玉器被赋予了礼制内涵;东周时期,君子比德于玉,玉器逐渐人格化,成为品德的象征。古代社会,玉器常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思想与意识的载体。揭示上层物质文化的象征意义、思想内涵和价值信仰等,不仅是研究考古学大传统的关键内容,更是我们理解古代文化、解读中华文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

(二)考古学小传统的特点

普通民众的小传统,在考古学中主要表现为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遗存,包括小型居址、墓葬、陶窑等遗迹,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

1. 稳定性

考古学小传统是平民阶层自发形成的文化,它源自下层人民的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基本的生存需求,如饮食、服饰、居住和交通,这些需求在物质文化中主要体现为小型墓葬、平民居所以及陶器等遗存。在没有遭遇重大社会变革或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小传统往往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文化惰性上的高度稳定。

进食是人们每天必不可少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饮食习惯逐渐定型,并日益根深蒂固。即使周边环境发生变化,饮食习惯也难以轻易改变。反映在考古学上,人们所使用的生活用具,尤其是与饮食相关的炊器,往往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不易随时间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此外,在中国古代的信仰体系中,祖先崇拜占据较为突出的位置,使得充满神圣性的葬俗也相对稳定,难以轻易改变^②。

陕西省西安市贾里村西周墓葬,是一处小型的平民墓地,年代为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墓葬内设腰坑并殉狗,随葬商式陶簋、陶豆、分裆鬲、陶瓮等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③。相比之下,西周都邑周原发现的殷遗民墓葬,其显著特点是有腰坑殉牲,且随葬的同类型陶器多为偶数,然而随葬的陶鬲基本为周文化风格的联裆鬲^④,与贾里村墓葬随葬分裆鬲、商式簋且

多见商式陶豆和陶瓮不同。由此可见,贾里村殷遗民墓葬的商文化风格更为浓厚,这主要是因为贾里村的平民阶层受到周文化联裆鬲大传统的影响小,具有一定的文化惯性。因此,西周王朝建立后,尽管青铜礼器和联裆鬲等典型器成为上层文化的代表,但是作为小传统的殷民旧俗依然延续。这也表明,葬俗与炊器相比更具稳定性,在考古学文化族群属性的研究中更具标识意义。考古学小传统所具有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人群族属判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2. 自足性

小传统是平民阶层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主要围绕基本的生存需求和生活实践展开。不同于上层阶级所创造的文化大传统,小传统并没有扩大文化影响力的迫切需要,也不以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为目标。相反,小传统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自足性和内向性,专注于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和社会实践,其文化观念以实用性和功能性为导向。这种文化形式相对封闭,主要在特定的区域或群体内部传承和发展。

新石器时代,以玉器为代表的文化大传统逐渐形成。尽管不同地区的玉器类型在象征神权、王权、军权方面各有侧重^⑤,但玉文化总体上已成为大传统的重要标志。而各地以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小传统却千差万别,苏秉琦先生曾依据陶器的差异,将史前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类型^⑥,其中所体现的更多是小传统的差异。进入西周时期,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代表的礼乐文化大传统,但是在区域范围内,仍存在着以联裆鬲、分裆鬲、高领袋足鬲等不同类型炊器为特色的小传统。由于小传统具有一定的自足性,跨区域的文化交流相对较少,因此更容易产生地域特色,并形成不同的区系类型。

3. 实用性

考古学小传统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征,这种特征源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小传统所包含的文化遗存,如日用器具、小型房屋和小型墓葬等,直观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而较少体现象征性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以西安北郊发现的一批战国至秦代的秦人墓葬为例,这些墓葬以小型墓为主,是一处典

型的平民墓地,墓葬结构简单,葬具多为单棺,出土器物以日用陶器为主,仅有少量陶礼器^⑦。墓葬的随葬品多为日常生活所需,显示出平民阶层对实用性的重视,而非对礼仪或象征性物品的追求。此外,根据以往考古发掘规律,小型房址内常见室内灶址,出土遗物多为陶片和生产工具,既反映了平民百姓的日常饮食和劳作情况,也体现了小传统的实用性。这些遗存更多地体现了平民阶层对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

总体而言,考古学小传统反映的是下层民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其文化遗存多为满足日常需求的实用物品。与之相对,关于社会发展大势、政治体制、礼制内涵以及高端技术等更具象征意义的文化内容,在小传统中较难发现。这种差异是小传统与大传统在文化功能和社会阶层上的本质区别造成的。

考古学大传统与小传统各具特点,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对于考古学大传统,应着重揭示其中蕴含的政治思想、文化内涵、象征意义及文化传播;对于考古学小传统,则需重点关注其反映的生产与生活状况、区域考古学文化特色以及族群属性。在面对不同类型的遗存时,需明确其能够揭示的具体内容,两者结合方能更好地阐释古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考古学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

上层精英集团创造的文化大传统与下层平民自发形成的文化小传统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推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 一致性与差异性

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上层统治阶级创立的大传统易于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下层平民创造的小传统容易产生区域特色。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化都是由大传统和小传统共同构成的,但不同区域的文化面貌未必能保持一致,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小传统上。

1. 大、小传统的一致性

研究考古学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需要对不同类型遗存的属性进行区分。古代都城所代表的文化基本属于大传统,一致性较高。然而,在

远离都城的地方封邑,文化面貌相对复杂。一方面,地方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文化仍属于大传统;另一方面,处于乡野之中的下层民众所创造的文化则属于小传统。在特定条件下,地方的大传统、小传统与统治中心的大传统可以是一致的。

商汤灭夏,于亳地(郑州商城)建立商朝,形成了以青铜礼器、玉礼器、分裆鬲等为代表的大传统。与此同时,商王朝在地方设立的众多方国中,既存在地方上层集团代表的大传统,也有下层平民创造的小传统。

盘龙城遗址大型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工具和陶器,其器形和纹饰均与郑州商文化的同类器物高度相似;小型墓葬和居址中出土的陶器则有中原文化、江汉土著文化、湖熟文化、江南商代文化及印纹硬陶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其中以中原商文化因素为主体^⑧。陕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遗址发现有中型和小型墓葬,中型墓的墓葬形制以及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与中原商文化基本一致;小型墓出土的陶器以鬲为主,一般为侈沿,方唇或圆唇,三足肥大,足跟多素面抹光,也有绳纹施至足尖的^⑨。从总体器形来看,这些陶鬲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陶鬲相似,均为分裆鬲,只是细部存在差异,表明其文化主体应来源于商文化。盘龙城、老牛坡等遗址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在文化面貌上与商王朝中心的同类器物一致,同时这两处遗址中小型墓葬中以陶器为代表的小传统,器形和纹饰也与商代都城发现的陶器相一致,由此可见,两者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均与商代都城所体现的大传统保持一致。

中央大传统与地方大、小传统的一致性,反映了中央统治力量对地方各个阶层的深度渗透。然而,这种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完全相同,而是指在总体文化格局和核心文化内涵上保持一致。受区域环境的影响,地方大传统和小传统在细节上会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

2. 大、小传统的差异性

由于大传统具有较强的传播性和普及性,小传统则表现出相对的自足性和稳定性,这种文化属性的反差容易导致一个地区大传统和小

传统的发展并不同频,从而造成地方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与中央统治中心文化大传统存在一定的差异。

寨沟遗址后刘家塔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等器物,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在殷墟高等级墓葬中发现有类似物,然而该遗址的墓葬口大底小,墓壁收分较大,有的壁面有生土台呈阶梯状逐层内收,墓葬形制和葬俗与殷墟商代墓葬存在明显差别^⑩。此外,寨沟遗址鱼塔梁小型墓葬中随葬的陶器以袋足鬲为主,其文化面貌与殷墟分裆鬲风格迥异,属于李家崖文化^⑪。

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遗址为代表的宝山文化拥有众多青铜器,被称为“城洋铜器群”或“城洋青铜器”,其中尊、罍、甗、鼎、簋、鬲、觚等容器,基本呈现中原商式风格,兵器、仪仗器则具有突出的地方特点;典型陶器高柄豆、高颈小平底尊、尊形小底杯、高柄器座、大口深腹罐、有鋁圈足尊、扁腹壶等,特色鲜明,与中原商文化的陶器种类和造型差异明显^⑫。

三星堆遗址埋藏坑出土的尊、甗、盘、罍等青铜礼器,明显仿效了中原商文化器形;琮、环、璧、瑗、戈等玉石器亦具有典型商文化风格。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立人像、跪坐人像、神树、戈等青铜器,金杖、面罩等金器,则具有典型的地方特征,反映了早期蜀文化的风格^⑬。三星堆平民阶层遗存的陶器以耸肩小平底罐、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盘、高柄豆、圈足豆、盃、鸟头把勺为代表^⑭,这些器物与中原商文化陶器风格差异甚大,陶器组合亦迥然相异。虽然三星堆文化的器物地方特色突出,但商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和玉器所占的比重不可言小。

吴城文化以吴城遗址为中心,出土的青铜礼器、生产工具和兵器等器物,与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陶器则呈现复杂的文化面貌,涵盖中原商文化、中原商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土著文化、盘龙城文化以及万年类型文化等多种元素,其中以中原商文化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陶器占主导^⑮。

寨沟、宝山、三星堆、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与中原商文化基本保持一致,显示出地方与中原统治中心在大传统上的一致性。然

而,这些遗址的陶器又呈现出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与以分裆鬲为典型特征的中原商文化陶器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地方小传统与中央大传统之间的不一致性。由于大传统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地方方国在大传统方面通常采用与王室一致的文化模式,而下层平民所创造的文化小传统是在当地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延续的本土文化,因此导致地方方国的小传统与王室大传统之间的不一致。

总体看来,考古学大传统在权力的支持和推动下,在不同区域往往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而考古学小传统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土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一特点对于解释商周时期地方方国或封国大、小传统文化面貌不一致的现象,具有指导意义。

在大、小传统之间,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为解释考古学文化中以上层阶级所使用的铜器、玉器及陶器等为代表的大传统,与以下层民众日常使用的陶器为代表的小传统,在文化面貌上呈现出的显著区别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相互影响

大传统和小传统虽各有特点,但两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大传统向小传统传播先进文化,小传统则会对大传统进行修正,以适应当地文化的发展。

1. 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渗透

大传统是由上层阶级创造的文化体系,其功能是为统治者服务。为了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中央政权需要借助地方统治机构来推行其文化理念和治国方略。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朝的郡县制,再到汉代的郡国并行制与州郡县制,以及唐代的道制、宋代的路制和元朝的行省制,这些制度都是中央政权对地方实施管理的具体形式。

地方统治集团作为中央政权在地方的代表,保持着与中央高度一致的文化大传统。他们不仅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传播中央文化大传统的组织机构,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架起桥梁,起到了衔接作用。

地方大传统在吸收中央大传统后,会将这些文化要素融入地方文化小传统之中,从而引

发地方小传统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变化的程度与地方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密切相关,在某些地区,小传统可能会因大传统的影响而发生显著转变,甚至与大传统趋于一致,例如前文所举盘龙城和老牛坡遗址。而在另一些地区,尽管受到大传统的影响,小传统仍然沿着自身原有的文化惯性继续发展,如前文提到的寨沟、宝山、三星堆和吴城遗址。

2. 小传统对大传统的推进

下层民众构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他们自发形成的小传统源自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长期浸润,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大传统在发展过程中会吸收小传统中适宜的部分,以丰富和完善自身。在地方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尤为紧密。地方大传统在接纳中央文化大传统的同时,也与当地的小传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地方大传统会受到小传统的影响,从而在其文化体系中融入小传统的因素。

陕西省宝鸡市虢国墓地发掘有27座贵族墓葬,出土铜器主要包括鼎、簋等青铜礼器组合,与周王朝的铜礼器基本保持一致。该墓地还出土有尖底罐、平底罐、浅盘器、曲柄斗形器等铜器,以及具有巴文化特色的兵器;随葬陶器多为尖底罐^⑥。由此可见,虢国墓地贵族墓葬随葬器物所显示大传统的文化主体与周文化传统相一致,但同时又存在小传统的地方特色铜器和陶器^⑦。虢国墓地出土的数量较多、特色显著的尖底罐与宝山文化的同类型器相似,应属于巴文化传统^⑧。尖底罐、平底罐、浅盘器、曲柄斗形器等铜器的出现,表明巴文化等对此墓地以铜器为代表的大传统产生了影响。该贵族墓地出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级器物应是在小传统影响下而产生的。考古学大传统中蕴含有小传统的文化因素,是两者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是地方文化特色的体现。

大传统和小传统相互影响。由于大传统是由上层精英集团所创造,其对小传统的影响往往能够导致小传统的文化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与之相对,下层民众创造的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影响则相对有限,通常只是使大传统中融入某些小传统的文化因素,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大传统的核心文化内涵。

结 语

大传统和小传统形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两者的社会角色各不相同。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将考古遗存分为上、下两个层次,打破了以往对考古遗存单一化的认知惯性。通过将大、小传统作为认识物质遗存的两个维度,并将其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中进行考察,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其文化内涵。同时,该理论能够有效解释考古学中大传统的先进性、传播性、象征意义与小传统的稳定性、自足性、实用性,深入剖析大、小传统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二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等问题。尤其是对于区域考古学文化中存在的文化内涵面貌不一致现象的理解,这一理论具有不容忽视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著,王莹译:《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117页。②梁云、安婷宇:《试论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的指示意义》,《江汉考古》2023年第6期。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贾里村西周遗址》,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161页。④周原考古队:《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547页。⑤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⑥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

物》1981年第5期。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87页。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498页。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335页。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2期。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2期。⑫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180页。⑬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448页,第424—427页。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424页。⑯⑰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451页,第6—11页。⑱赵丛苍:《从考古新发现看早期巴文化:附论巴蜀文化讨论中的相关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M].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5.
- [2]徐良高.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J].考古,2014(9):51.

On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of Archaeology

Zeng Li, Zhao Congcang

Abstract: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a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anthropology for explain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They offer a possible interpre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 present in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he great tradition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culture created by the ruling upper class, characterized by progressive, authoritative, dissemination,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The little tradition, by contrast, represents the culture of the lower class, marked by stability, self-containedness, and an orientation toward everyday life. Although the great and little traditions occupy different hierarchical levels, they are interconnected. In the civilized stage, the great tradition tend to be highly consistent across regions, while regional little traditions may align with or differ from it. The two traditions influenc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gether forming a complete society. Introducing the theories of great and little traditions to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s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of ancient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regional archaeology.

Keywords: great tradition; little tradition;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culture; cultural level

[责任编辑/观 澜]